



*A Study of American Critical Humanism:
Irving Babbitt, Lionel Trilling and Edward Said*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

——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

段俊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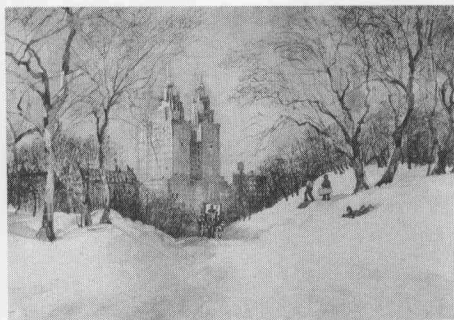
本书以美国社会之发展，人文思想之嬗变；聚焦美国批判人文主义三位核心人物——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的人文思想。通过纵向联系、横向比较，对其思想谱系进行批判性探究；挖掘其在历史语境和当今世界中的深层意义，指陈其局限性，以东方学人的身份提出一条可供选择的新思路。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70637

B712. 59
72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

——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



段俊晖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712. 59
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段俊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9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2369-7

I. ①美… II. ②段… III. ①白璧德, O. (1865—1933)—思想评论
②特里林, L. (1905—1975)—思想评论③萨义德, E. W. (1935—2003)—
思想评论 IV. ①B712.59②B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0626 号

书 名: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

著作责任者: 段俊晖 著

责任编辑: 刘文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369-7/H·32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liuwengjing008@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1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3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本研究得到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0SK112)

四川外语学院学术专著后期资助

在此谨致谢意!

探索的意义:人文精神与学术品格(代序)

王晓路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无疑是世界最早地进入农业生产方式的文化区域之一。在其外部条件和内部组织形态下,中国人探索出了自身的一套观察与解释的智慧系统,对于农业文明贡献良多,毋庸讳言。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文明关系是一种互相影响、碰撞和交融的关系,虽然其间有经历异族统治和文化碰撞的历史事件,但并没有遭遇过强大的、根本性的挑战。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大规模的交融。佛教的翻译与地方化,不仅使中国人的民间信仰出现了复数形态,而且对于汉语词汇、逻辑、志怪小说中的结构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格义式的佛经翻译本身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次集中的跨文化的阐释。而在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时期,一些传教士也受到中国文化吸引,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并且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欧洲语言介绍到欧洲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对中国四书的翻译以及他和徐光启合作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等。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则翻译了28卷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诚然,他的翻译和解释也要符合《圣经》的解释,但这并不影响让欧洲人看到了不同于自身的另一种文化精神和思想智慧。近代学人将一些日语的表达方式介绍到中国来,而这些所谓现代日语新词又是从欧美译介的,中国学界尔后又直接从西方引介了不少词汇,所以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话语中有不少外来语。概言之,文化与学术总是相互影响和汲取的。

全球的发展与欧洲17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资本所形成的社会文化比较彻底地瓦解了农耕时代的固有模式。所以直至晚清,中国才第一次感到文化上的挑战。一是关于治理术的合法性。基于血缘传统与基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理念所形成的冲击可谓异常强烈,因为制度文化的设计与实施决定民生状态。中国当时一些官员和学人均看到了西欧和东亚一些国家的社会样态和治理方式,这使他们深感变法之必

2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

须;其二是知识取向发生转变。因为文献文化虽然可以形成族群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品格,但这一观念要素必须面对现代精神开放。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知识的不同结构和功能亦随之显现。从这个时代开始,关于知识的解释权力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逐渐让位给知识普及与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教育开始为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并形成推动力。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概念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其新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当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种理想的提法,因为以道德为支撑的体系如何应对以知识为取向的系统成为了一个问题,知识结构的危机出现了。所以晚清政府也感到了压力,当时曾派遣一百多名留美学童,希望他们能够学到实用之学。可惜这个计划因种种原因提前中断了。另外,社会发展与知识及观念的普及有关,在当时中国的文盲比例高达80%以上,至20世纪前半期都处于危机、战乱、饥荒、动荡之中,温饱都没有解决之际,要谈文化传统的传承、社会的改良等等奢侈的话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比较焦虑和着急的,一些口号今天看来也是很激进的,对此,我们并不能苛求他们,因为这和时代的境遇有关系。因此,虽然我们的文明史很悠久,但现代观念、现代制度、现代教育等层面的历史却是很短的。包括我们今天大学的学科、专业、学位、课程等等都是对现代西方大学体制的复制。直至今日,中国学界的诸多论题均与西学的资源、论域和分析模式密切相关。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巨大的变化呈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随之而来的是日趋明显的文化样态和观念形态上的变化。国内学界面对本土的社会文化现状也开始进行新的审视、探索并寻求新的解释资源。在中国大陆新时期,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土壤中的诸多思想一直是重要的借鉴性资源。中国大陆学界一方面不断探寻“新知”,译介西学“新说”,这当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大力进行跟进式、认定式的“时尚”译介,即西方有何“新说”就赶着译介过来,对某种新说和老的“新说”之间也不进行关联式的深入研究。而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应有的耐心和系统的研究,造成截取西学中的某些概念、范畴以及术语,将其进行“硬着陆”,在不进行历史还原的前提下加以硬性言说,其中的问题是很多的。这说明中国大陆学术本身的现代进程尚未完成,如中国大陆学术论著和学术期刊尚无统一的学术规范,最基本的规范意识甚至在研究生阶段还在呼吁和培养当中。所以,在整体上,其学术品格和严谨态度上还未通达

到知识生存与知识共享的接轨水准。这正如国内一些学人,主要的努力都一直是在介绍不同阶段的西学成果,将这些成果编译、转述为汉语,让一些不懂西文的人接下去言说;然后又将中国大陆一些文化现象套上这些西学帽子,形成西学理论的跨文化注释,证明其普适价值,再返回西方学界,如此形成无效的学术旅行,而没有形成自己的洞察。所以这样的研究并无真正的影响力。而反观美国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人数少之又少,但其成果对中国学界影响巨大,其根本原因是学理性和学术洞察力。实际上,西方思想是其历史哲学追问的结果,一种追问总是与之前的思想发展以及结构性缺陷有关。文明区域的发展脱离不了思想史的发展,中国和东亚、南亚各国以及由许多民族国家构成的西方,都存在着丰厚、博大和深邃的思想资源;此外,这些资源以及相关的人文研究领域都是在一个动态的发展模式中不断变化、生成的。因而,在引入西学新知,或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观察社会文化中的事实,了解不同社会、时代的文化样态和观念形态的变化及观念之间的联系。同时,注意将西学中有关的知识点还原到其知识谱系结构的对应点中,审视其流变和可资借鉴的原创力和嫁接力。所以,对于美国人文思想,尤其对其背后所特有的诠释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借鉴。

俊晖君的专著《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就是他本人在这个领域中持续思考的结果。该书以近百年美国社会的发展、人文思想的演变为背景,集中论述了以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为核心的美国批判人文主义思想,是目前国内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他在传统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上力图打通学科壁垒,借助文、史、哲等多学科资源,通过追本溯源、纵向联系、横向比较的方法,以白璧德、特里林和萨义德等三人为代表的美国人文思想进行了历时性探究,在挖掘其在历史语境和当今世界中的深层意义的同时,也从学理层面并采纳批判性思辨的方式指出其相对局限性,并以一位中国研究者的身份提出具有建构意义的新思路。此书的新意较多,例如他在其论述中指出:在近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其人文思想转变的研究,事实上在很多层面都触及乃至直指人类所处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核心问题。这个现代世界诞生的国家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却具有世界上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历史。它的表述不仅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相关,而且与扩张和探索相连;不仅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包括文化帝国的征服,而且折射出大

规模移民和族群关系的紧张,反映出组织形态、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规约之间不间断的斗争。它一方面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又饱含了身为“美国人”的极为痛苦的集体焦虑。正是这种强烈的焦虑之情和“救民主于乱世”的殷切期望促使美国人文学者不断对美国各时代的极端、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并对“人文主义”进行重新审视和界定,以期在批判中重建某种普世的人文精神,在建构中进一步发现并避免西方人文传统的局限性,以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寻找其在当今世界的合理性和适应性,拓展其内涵与外延。作者在此基础上,注意将人文主义还原到其知识谱系的对应点中,注意发现其可资借鉴的原创力和嫁接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研究不仅在相关领域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显示了当代青年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

俊晖君来校攻博时已经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了。记得他当时对美国的人文思想传统一直抱有兴趣,后来也就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了博士论文的思考和撰写。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不断修改而成。4年前,俊晖的博士论文就因其研究内容翔实、文笔平实、行文规范受到论文盲审专家和论文答辩专家的一致好评。今日之专著既是他近几年继续潜心钻研、精雕细琢的成果,也是他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的体现。我本人看到学生能不断跟进,持续思考,总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实际上,博士生的学术眼光、洞察力、可持续科研水平和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大陆学术近期的未来走向。本人衷心希望俊晖能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进步,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2013年7月

目 录

探索的意义:人文精神与学术品格(代序)	1
绪论	1
第一节 跨世纪文化重建与穿越西学	1
第二节 批判人文主义研究面面观	10
第一章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的进路	38
第一节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传统的嬗变背景及思想特征	41
第二节 白璧德:围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人文主义者	67
第三节 特里林:现代世界的传统人文主义者	82
第四节 萨义德:用人文主义做最后抵抗的世俗批评家	91
第二章 道德想象的界限	105
第一节 田园想象和道德想象	107
第二节 自由想象与复杂想象	119
第三节 文化表征与帝国想象	133
第三章 自我的超越和主体性的复归	153
第一节 白璧德与更高自我	155
第二节 特里林与对抗的自我	166
第三节 萨义德与后殖民主体性	190
第四章 人文主义和民主精神	214
第一节 民主与领袖	214
第二节 文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文学化	233
第三节 人文主义民主实践与巴勒斯坦事业	248

2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

结语 批判人文主义的跨世纪展望:一种东方视域	266
第一节 批判人文主义的三次转变	266
第二节 内外兼修的新人文主义	282
参考文献	287
后记	307

绪 论

第一节 跨世纪文化重建与穿越西学

自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新旧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中都表现得尤为突出。身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为之困扰,进而著书撰文,冀望能通过一己或群体之力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当代社会的人文困惑间搭建起一座互动的平台,不仅可以使中华的精神血脉得以续传,更能创造出与新时代相契合的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早在 19 世纪末叶就不断有人提出讨论,“五四”以后,中西文化的争议更是高潮迭起。时至今日,“本位文化”、“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等旧说法已成明日黄花。今人更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即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① 余英时认为

70 年代以来一切关于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怎样调整它自己以适应现代的生活。因此今天中国所谓文化重建绝不仅仅是旧传统的“复兴”问题。近代中国虽屡经战乱,但并没有遭到中古欧洲被“蛮人”征服的命运,在文化上更没有进入任何“黑暗”时代。“文艺复兴”(Renaissance)在中国的出现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许多人所深为慨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其实乃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蜕变历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回顾,这个历程中诚不免充满着非理性的盲动。……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重建无可避免地要包含着新的内

^① 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有专文论述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详见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一文。(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2 美国批判人文主义研究

容,那么西方的价值与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由于近百余年来各种西方的价值与观念一直不断地在侵蚀着中国,中国文化早已不能保持它的本来面目了。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怎样能通过自觉的努力以导使文化变迁朝着最合理的方面发展而已。^①

他还指出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现阶段所面临的基本情势是: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因为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是处于一种不健康的急迫心理的压力之下,“五四”学人亦不例外。他们往往不能对中西文化在道德、宗教等精神层面所遭遇到的现代危机有任何深刻的同情和理解。然而,真正的

文化重建必须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真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这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应该从事但是却并没有认真进行过的基本工作。中西文化传统都包涵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成分,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得尽的。我们有时为了讨论的方便,不免要用某些简单明了的概念来对中西文化做一种总提式的描述。……“五四”以来好几次所谓“文化论战”都足以说明这种情况。所以就文化重建的主观条件而言,我们首先必须调整观念,尽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重蹈以往论战双方那种褊狭武断的覆辙。^②

陈寅恪先生亦曾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友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招示者也。”^③余、陈两位先生的谆谆至言中都讲到了文化重建的两个必要前提,即一方面要认真地“整理国故”,一方面要忠实地吸收输入外来思想。余英时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绩还很有限,尤其是后者。因此,他指出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

①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载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47年,附录。

书馆或实验室去默默地努力。佛教之所以能震荡中国,正是由于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许多大师不断地埋头译经。在看似热闹非凡的译事背后是隐退而寂寞的工作。如果我们承认吸收西方各种学说是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一环,那么这些佛教大师依然是我们师法的范例。从整个文化史的观点看,这种“退”并不是消极逃避,而是最积极的进取。^①

如果说陈寅恪和余英时二人的观点已经为中国文化重建定下了某种基调的话,那么张隆溪和张旭东两位当代学者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定位及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则更具实效性,给人更多启发。张隆溪教授在《道与逻各斯》的中译本序中这样说道:

中西文学的实际接触和相互影响当然值得研究,但超出影响研究之外,以理论问题作为比较的基础,则可能天地更为广阔,意义更为深远。……任何理论总是从具体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理论的普遍性及其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间,总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和紧张关系,理论探讨也就应当处理这种紧张关系,考虑理论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适用性。因此,理论固然可以为比较研究开辟新的天地,但是真正具有理论性的研究,就必须把不同的文化传统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做批判性的思考,那么理论研究首先就需对理论本身也做批判性的思考。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毋庸讳言,近代以来我们讨论文学和文化所采用的理论,大部分都来源于西方。如何在采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使理论探讨符合我们所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实际,的确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一方面,种族自我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即那种把东方文化优越论作为比较研究预先设定的目的,我以为是毫不可取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不能拾人牙慧。把西方各种最新的时髦理论作为依据和标准,而完全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形。如何达到合理的平衡,这需要在每一个研究课题中视具体的情形而定,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重要的恐怕是要强调认真研究和独立思考的能力。^②

张隆溪的说法中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强调以理论问题为基础的

①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61—62页。

②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译,成都:四川人文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比较研究的天地更为宽广,意义更为深远。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其次,他指出在理论研究中必须把不同文化传统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既要避免东方文化优越论的种族自我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又要避免以西方理论为标准的“崇洋媚西”主义。最后,他认为时下的研究,一定要视具体的研究课题来决定如何达到这种平衡。他尤为强调认真研究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上述观点中不难看出他与余、陈二人对中国学界引入西方理论的共同担忧,即国人能否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忠实地移入西方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嫁接和融合。

对于这个问题,张旭东教授谈得更为直接明了。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和生活世界如何定位是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大问题,因而要有勇气去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人”这样的大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对于如何去做,他提出了一条较为理想的比较文化研究路径,即“穿越西方,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所谓“回到传统”就是要思考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做中国人”找到理论上和哲学上的意义。中国人如何回到传统,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自己的现在和怎样设想自己的未来。对“现在”和“未来”的界定其实就决定着对“历史”的叙述。这一点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它不断地把“他者”包容进来,不断地让“他者”来挑战自己,从而在同“异”和“变”的纠缠中不断地把“同”和“不变”阐释或生产出来。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前通过读经释经来解释传统,现在能否通过对西学的讨论来解释传统?以前只有读古书是界定中国传统,现在分析当代现象是否同样是界定传统?答案是肯定的,参与到西方文化讨论当中去,实际上就是要参与到当代重大现象的分析中去,而这些当代现象和事件是我们自己的当代史和现代性经验的组成部分,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史,不这样,对传统的谈论就碰不到真正的问题。从以往和现有的经验来看,绕过当代,躲过现代西方学术去谈论和接续传统是不可能的。相反,只有在与时代的正面碰撞中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如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时期,西学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核心部分。此外,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中国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维框架,因而,除了对现有的西方既成框架进行批判性反思,似乎也没有更为可行的路可走。故而,“穿越西

方”之后再回到传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①

上述四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把对西学的讨论作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当代的社会形势来看,张旭东提出的“穿越西方,回到传统”的研究理路最为大胆,也最具新意。他所说的“穿越西方”事实上包含了前三人所谈的西方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应忠实输入外来思想,二、应避免东方文化优越论的种族自我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以西方理论为标准的“崇洋媚西”主义。也就是说,文化重建的第一步是忠实、客观地研究西方文学文化理论或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还要提出批判性反思。唯有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才能回到传统,才有可能进一步与中国文化传统嫁接和融合,才会“重建自身历史的连续性,重建讨论自身历史的知识和价值框架的连续性”,只有这样,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价值才可能被当代人发挥出来。^②

与他们持相似观点的王晓路教授,在谈论中国文学研究的多重资源中亦极富见地地指出:中国人文研究的范式在整个20世纪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关系框架中,以某种刺激—反应、翻译—阐释或接受—再现的模式延续自身的人文学术。在这个阶段,学术界出现了一些需要注意的现象:“如缺乏应有的耐心和系统的研究而急于进行西学‘新说’的译介、截取西学中的某些概念或范畴以及术语进行不同类型问题的硬性言说等等,或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某种政治伦理学方式对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进行所谓的意识形态消解,也在历史上反复被证实是思想的极端愚昧”。他进一步指出,“问题的解决既不在于某种空疏的学问,也不在于在学术范式上努力争出民族气节,以学术的二元对立,中国与西方、或国学或西学(包括汉学)的方式对待原本丰富、博大和深邃的思想资源,而在于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一种学理层面的挖掘和对话”。这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重工作:其一,将西学中有关的知识还原到其知识谱系结构的对应点中,并注意其流变和可资借鉴的原创力和嫁接力;其二,挖掘自身传统中的元命题并进行筛选,融合到新的思想陈述之中,并针对具体的问题做出有效的探讨。^③ 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的是,王晓路教授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文研究所处的尴尬境地和学术界存在的问题,

①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王晓路:《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8—9页。

而且简洁却清晰地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解决途径。

然而,要对西学的知识点做谱系式还原,同时兼顾其流变和可资借鉴的原创力和嫁接力,就要求研究者面对古今中外文学文化的多重资源进行有重点、有目的的筛选。本书的立论也脱离不了这样的过程。

十余年前,乐黛云等学者曾高声疾呼:“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人类文化发展面临着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文化中心论和高科技使文化的多元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使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削弱,这必然导致世界文化资源无可挽回的流失;另一方面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这不是引向文化对抗就是引向文化衰微。”他们还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应对策略:文化危机和科学的新挑战呼唤新的人文精神。所谓“新”,不仅是指所面临的问题新,而且是指人类当前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也应和过去有所不同。^① 他们所说的“人文”既是指西方十五六世纪开始广泛使用的拉丁文 Humanitas(原意是人性、教养),也是指中国文化传统所讲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中的人文。具体而言,西方的“人文”是指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重视,以及研究如何提高人的地位,了解人的本质、前途和利益的种种考虑,其着重点大部分是落在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上;而中国的“人文”所强调的也是如何将人类社会化育为一个与天地相协调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天下”,但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不是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对人性的坏的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人文的目的是止于其所当止,以维持社会的和谐和安宁,也就是中国长久遵循的“发乎情而止于礼义,不及于乱”的共同原则。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他们列举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萨特和马尔库塞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以及哈贝马斯的“互为主观”交往理论等一系列能够支撑该说法的思想观点,同时指出在如何解决保持差异和多元共存的问题上,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也应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源。通过将上述中西方“人文”精神并置和比较,他们认为这种综合后的思想资源“既保障个人的尊重和个人的平等权利,同时又要求个人有同情和尊重他人的义务;既保障不同个人—社群—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差异,又要求彼此对话、商谈、和谐并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既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又避免本位文化的封闭和孤立,乃至引向战争和衰亡”。^② 这就是他们提倡的新人文精神的实质所在。

应该说,乐黛云等学者以知识分子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准确地指出了

① 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21 世纪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也提出了相应的令人振奋的“新人文”策略。然而其论证的方法和过程却值得商榷。如在论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时,他们借用白璧德“中国与西方的人文教育”一文中所说的“在明白认识分寸本身便由谦逊中来这一点上,孔子是优于许多西方人文主义者的”等论述,主观地认为“白璧德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就是参照中国的这种人文精神来立论的”,“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庸’、‘自律’已成为他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的基本支柱,他正是以此为基础来反对以培根为代表的超乎伦理的客观科学主义,也反对以卢梭为代表的,率性而行,不受道德规范的极端个人主义”。^① 这种说法显然是承袭了梁实秋、侯建等人的观点。^② 他们的原意是希望“穿越西方,回到传统”,但其做法却不仅违背了“穿越西方”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既没有忠实地输入外来思想,也没能超越中国文化优越论的限阈,而且缺乏论证的合理性——在悬置了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人文传统之后,简单地将几种有关“人文”的论述杂糅而谈,最终推引出一个并不能令人信服的理想结论。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由于这些学者在中国学界的巨大影响力,白璧德的人文思想在传入中国八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不能完全以其真实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侯健于 1980 年提交给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论文《白璧德在中国》(*Irving Babbitt in China*)第二章和第三章对“白璧德的思想”(The Ideas of Irving Babbitt)及“白璧德与中国思想”(Irving Babbitt and Chinese Thoughts)的论述与前文引述的说法却截然不同——在近五十页有关白璧德思想的论述中,侯健准确地分析了白氏人文主义所有关键词的西方来源,对其东方元素及影响几乎只字未提;而在后一章多达 55 页有关白璧德与中国思想的论述中,侯健论述的重点则是白璧德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偏误,^③他得出的结论是:“他(白璧德)完全被自己的宗教和哲学传统遮蔽了双眼。思想的民族优越感使他无法看到不需要宗教的人文主

① 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3 页。

② 侯健在《梁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一文中指出:白氏尊孔子为世界四大思想家(另三人为佛陀、苏格拉底和耶稣)。他的论著中儒家思想浓重,有的文章几乎是以儒家思想为阐释的根本。(参见侯健:《梁实秋先生的人文思想来源——白璧德的生平与志业》,《联合文学》第 31 期,1988 年。)彭歌也说:“亡友侯健先生对他(白璧德)深致钦迟,曾编著‘关于白璧德大师’一书,阐述其学术精义,认为他的思想精华,正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http://www.yifan.net/novels/prose/penggw/x/pgwx32.html>)

③ See Chien Hou, *Irving Babbitt in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Stony Brook,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1980), Chapter Two & Chapter Three.